

the Public Service Foundation for the Examinees

毛晓阳 著



清代 科举宾兴史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014034394

D691.3
31

Public-Service Foundation for the Examinees



本书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闽江学院科研启动项目资助

清代 科举宾兴史

毛晓阳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武汉



北航

C1722692

D691.3
31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科举宾兴史/毛晓阳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
(科举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6497-2

I. ①清… II. ①毛… III. ①科举制度—历史—中国—清代
IV. ①D69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7740 号

清代科举宾兴史

©毛晓阳 著

责任编辑:卢格蕙 冯会平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制作:胡 灿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装帧设计:甘 英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6.5

版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0 千字

定价:5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不仅科举人物、科第人物成千上万，而且科举文献、科举文章也数不胜数。在与科举相关的纷繁复杂的活动和术语中，宾兴只是其中一个组织和术语，但已有十分丰厚的内容。

宾兴并不属于科举制度本身，而是一种围绕科举的社会公益基金组织，其设立目的是为本族或本地科举士子提供赴考旅费、考试卷费等经济支持。宾兴对家道殷实的举子有奖励之用，对家境清寒的举子更有帮助，犹如雪中送炭。

“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传统中国社会流行着通过读书应举改变命运的观念。宋代朱熹曾有过“家贫亲老，未免应举”的说法，到清代章学诚也说“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但是，应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历十年寒窗，才有可能一举成名。读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数人赶考要远离家乡，无论是读书还是赴考，都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时候，别说车马兼程两三个月赶到京城参加会试，就是到省城或府治去参加乡试和院试，短的也要走几天，路途遥远的甚至要走半个月以上。到了省城或京师，还要租房住下。乡会试期间，举子本人和书童、马车夫，有的还包括亲戚一起陪伴赴考，省会和京城人口增加数万甚至上十万，房租自然大幅上涨。正是因为有科举宾兴这类资助办法，许多贫寒士子才可能支付这些开支，实现中举登科的梦想。

“一士登科甲，九族光彩新。”在科举时代，一个人中举及第，意味着改变人生命运，山川变色，天地为宽，可以获得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好处。唐武宗以后，进士及第者便成为“衣冠户”，甚至可以优免合家的赋役。后来各代生员中的一些人可以领取“廪膳”，科第中人皆由政府免除本身所承担的赋役。到清代，举人和生员享有不止一人免纳丁税的待遇，其家族中也有人可享受这种特

权，考上进士更是可以光耀门楣，举族荣光。因此，科第不仅是举子个人梦寐以求尽力追求的对象，也是家族和地方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这有点像当今地方和单位一起为当事人能够获得奥运奖牌或当选院士，共襄盛举一起努力一样。

王定保《唐摭言》有言：“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科举时代，人们很讲究“族”的概念，本族人只要有一个人中举及第，便可以有形无形地惠及全族人。因此自宋代以来，一些家族便开始设立义庄资助子弟应举，而地方官员或地方士绅也多有设立进士庄、贡士庄、兴贤庄、宾兴庄等社会性公益基金组织以资助本地士子赴考者。到了清代，宾兴臻于繁盛，且日益超出家族公益的范畴，各地尤其是南方诸省普遍设立宾兴组织，以支持本地的“读书种子”。宾兴的名称五花八门，除了最常见的宾兴田、宾兴会、宾兴馆以外，还包括科举田、科试路费田、童试卷资田、乡会试卷资田、乡闱卷资田、应科甲田、科举仓、乡会仓、科举店、科举公租、科费、闾费、科举卷资、偕计费、公车费等，名目繁多。清代科举宾兴作为一种公益组织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在资助和鼓励士子读书应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随着科举废止，宾兴这种善俗，这一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在清末以后逐渐消失于无形，迄今已经很少人知道“宾兴”一词了。如何发潜阐幽，将科举宾兴的历史发掘出来，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要系统研究科举宾兴，需占有宏富的资料。

收集资料是写论著的基础，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就是靠资料或文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资料就是粮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又如煮饭的米，没有米的话，再会做饭都没有用。著名国学大师陈垣说过：搜集资料要费百分之九十七八的功夫，撰写成文则仅费百分之二三的功夫而已。确实，对有的专题研究来说，资料是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比较小的题目，在资料收集方面是多多益善，最好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将所有相关的资料搜罗殆尽，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研究便有扎实的根底，写出的论著，将来其他人研究同一专题都绕不过去。“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这是一句从先秦时期就开始流行的古代谚语，语出《韩非子·五蠹》，意思是说，衣袖长，跳

起舞来自然好看；资本多，做生意便会顺利。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贴切地用来形容科研中的资料收集。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便是史科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曾形容收集资料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就是指收集资料要有穷追不舍的精神，手脚都行动起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在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有资料，谁就是专家。做学问最好要有连续性，“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门子心思钻进去。晓阳博士在浙江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科举学家龚延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清代江西进士。来厦门大学跟我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不期然而然地选定清代科举宾兴这一专题。近年来他对宾兴情有独钟，见到“宾兴”二字就两眼发亮。秉承龚先生做扎实学问的传统，晓阳博士在研究中十分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了尽量完整地掌握宾兴史料，他着实下了坐冷板凳的功夫。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几乎每天都与图书馆管理人员一同在早上8点开门进馆，被图书馆管理员称之为到厦门大学图书馆“上班”的博士。

晓阳博士经过艰苦搜寻，在掌握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社会公益视野下的清代科举宾兴研究”这一国家社科项目研究，将科举宾兴置于社会公益史的视角进行考察，考察了清代科举宾兴的历史渊源，以及清代宾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时空分布，认为科举宾兴是清代教育经费中除儒学、书院资产之外的第三大门类，进而揭示清末科举宾兴转型、消亡的历史结局。作者并从公益捐资的倡议发起、公益组织的内部管理、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督、公益思想的舆论宣传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探索。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项以清代全国科举宾兴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成果，一些结论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拓展了中国教育公益史的研究领域。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晓阳博士在科举学这片广阔的领域中勤力耕耘“宾兴田”，于今丰收在望，即将刊诸枣梨，嘉惠学林，故乐书数语以为序。

刘海峰

2013年12月23日

绪 论	(1)
第一章 清代科举宾兴及其产生的原因	(19)
第一节 清代科举宾兴释义	(19)
第二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历史文化渊源	(34)
第三节 清代科举宾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70)
第二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时空分布	(80)
第一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时间分布与特点	(80)
第二节 清代科举宾兴的空间分布与特点	(112)
第三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级别类型	(148)
第一节 地域分级与清代科举宾兴的分类	(148)
第二节 科举分级与清代科举宾兴的分类	(167)
第四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教育与社会影响	(188)
第一节 清代科举宾兴与教育经费分布格局的演变	(188)
第二节 清代科举宾兴对各地科举成绩的影响	(217)
第三节 清代科举宾兴对基层地方社会的影响	(241)
第五章 晚清民初科举宾兴的存废	(256)

第一节 太平天国战争与清代科举宾兴	(256)
第二节 废科举兴学堂与科举宾兴的存废	(270)
第三节 清代科举宾兴与民国教育公益基金	(296)
第六章 清代科举宾兴的现实观照	(323)
参考文献	(339)
后 记	(414)

1

Chapter 5 The Development of Keju Binxing at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China (256)

Section 1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aipingtiaoguo War (256)

Section 2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odern Education Reformation after Keju Abolished (270)

Section 3 The Keju Binxing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296)

Chapter 6 Practical Introspection on Keju Binxing (323)

References (339)

Postscript (414)

绪论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平”是一个很崇高的理想。但是，“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的事，只有极少数身居庙堂的高级知识分子才能有完整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历程，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只能追求“修身”和“齐家”两种修为的完善。不过，也正因为这些绝大多数人的努力，才使传统中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以追求家族关系和谐为主要特色的宗族社会，明清以来的传统中国社会则尤其如此。

从国家职官系统来看，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行政单位，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则主要由宗族力量控制；作为宗族力量的代表，地方绅士是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中间势力。在这样一种二元的权力分割基层社会体系中，很难出现当代西方学者所界定的具有第三部门属性的社会公益组织。秦晖（1999年）的研究便指出，除了带有明显行业特色的行会以及乡族色彩的同乡会，中国古代的社会公益事业主要仅有社邑、寺庙以及宗族公益三种，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第三部门属性都比较有限，因为社邑更接近于一种互助组织，寺庙公益则多以从事慈善活动为主，宗族公益则更是一种有限公益。

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了宗族性、互助性以及慈善性的公益活动及公益组织呢？本书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明清以来科举社会中的科举宾兴就是这样一种以公益为目的、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颇具第三部门色彩的社会公益基金组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不论是教育史学界还是历史学界，都较少有宾兴研究成果、尤其是研究专著的出现，这与科举宾兴组织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颇不相称。

一、科举宾兴研究综述

总体来说,20 世纪的科举宾兴研究基本处于起步阶段,不仅文章的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数文章都发表于各地文史资料中,学术质量有待提高。涉及的地域也主要以广西、广东等地宾兴为主,缺乏对各省乃至全国各地宾兴的整体性研究。

20 世纪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宾兴研究论文较为少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一文。此文最初于 1961 年 6 月发表于台北《清华学报》新 2 卷第 2 期,1996 年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2006 年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联陞《中国语文札记》。文章从通史的视域,选取自宋代至清代的典型史料,全面论述了科举时代的科举旅费问题。文章指出:“总括以上所说,关于赴考旅费,南宋地方政府有贡士庄,明清中央政府有补助银两,清中叶以后有官绅士民合立的宾兴会等组织;私人方面,家族则北宋以来有义庄,地方则明中叶以后有同乡会馆,这都是所谓义举。”^①这段话显示文章所说的“科举旅费”,既包括政府财政性科举经费,也包括社会公益性宾兴,还包括家族义庄、同乡会馆等,可谓相当广泛,宾兴只是其中一类。该文还为后人提供研究科举旅费的多种研究视野:“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说,例如基金观念,在近代渐渐通行,发商生息一类举动,愈来愈多。又绅商士民的自治组织,自南宋以来,大为增加。而发展又受政府限制,法人地位不明确,自治组织的产业,往往要请政府特别保护,才得维持。从史地关系上说,如江西自南宋以降,人文特盛,与这各种义举之多,想来是互为因果的。”^②

20 世纪发表于各地文史资料的宾兴文章主要有以下各篇:覃义炯《兴业宾兴馆沿革》认为宾兴馆创建的目的是“以蒸尝形式组成一条纽带,勾结所有士绅,来统治人民及培养封建阶级所需要的人才”^③。邓杰《廉江宾兴简介》介绍

① 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载《清华学报》,1961 年新 2 卷第 2 期,第 127~128 页。

② 杨联陞:《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载《清华学报》,1961 年新 2 卷第 2 期,第 128 页。

③ 覃义炯:《兴业宾兴馆沿革》,载《玉林县文史资料》,1983 年第 4 辑,第 50~51 页。

了该县清代至民国年间的两项宾兴，指出宾兴成立的宗旨是“帮助考试生员解决学费、川资困难的”^①。雷方圣《宾兴馆简说》主要从“人员的设置与职责”、“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与支销”三个方面，介绍了清代嘉庆到民国年间江陵宾兴馆的发展演变情况^②。陈衍英《郁林县宾兴馆的建置和财产史略》叙述了宾兴馆的由来、玉林宾兴馆的建置时代、宾兴馆财产的管理以及民国年间宾兴馆的演变情况^③。关勋《西宾兴公所》根据县志的记载及父老传说，介绍了遂昌县西宾兴公所的建立时间、馆内布景、事务管理、最后结局等情况，并极为谨慎地评价了其历史功过^④。王宝英《合浦宾兴馆珠瀛学堂》根据相关人员的口述，介绍了清代至民国年间该县宾兴馆的兴建、管理、产业、奖学、祭祀等情况，并指出“宾兴馆产业是奖学的津贴费用，历年军阀贪官都不敢过问”^⑤。韩美周《合浦宾兴馆和珠瀛书院》讨论的对象也是合浦县宾兴馆和珠瀛学堂（其前身为珠瀛书院），但对宾兴馆的介绍则更为简略^⑥。邹永祥《宾兴·公车·卧碑——漫话惠州宾兴馆》根据惠州桥西金带街桥西环管所职工宿舍中残存的《宾兴馆碑记》、《宾兴馆条约》，对宾兴馆的建立、职能进行了分析^⑦。关立雄《漫述容县宾兴馆》介绍了宾兴馆的建立、资产来源、财产管理、经费支用及历史结局等情况，指出宾兴“对发展容县地方文化教育事业，造就各类人才，确实有所帮助”^⑧。周树仁《谈谈宾兴馆》认为“宾兴馆是封建性的结合体，有其糟粕，但取其精华，为鼓励青年求学上进的意旨是可取的”^⑨。杨海峰《宾兴：近代本县的“教育基金会”》高度评价了宾兴活动，认为宾兴“是先人们的创举”，在

① 邓杰：《廉江宾兴简介》，载《廉江文史资料》，1985年第2辑，第43页。

② 雷方圣：《宾兴馆简说》，载《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5年第5—6期，第53页。

③ 陈衍英：《郁林县宾兴馆的建置和财产史略》，载《玉林市文史资料》，1986年第11辑，第76页。

④ 关勋：《西宾兴公所》，载《遂昌文史资料》，1986年第3辑，第52页。

⑤ 王宝英：《合浦宾兴馆珠瀛学堂》，载《合浦文史资料》，1987年第5辑，第81页。

⑥ 韩美周：《合浦宾兴馆和珠瀛书院》，载《合浦文史资料》，1988年第6辑，第56页。

⑦ 邹永祥：《宾兴·公车·卧碑——漫话惠州宾兴馆》，载《惠州文史资料》，1987年第3辑，第207页。

⑧ 关立雄：《漫述容县宾兴馆》，载《容县文史拾零》，1987年第2辑，第3页。

⑨ 周树仁：《谈谈宾兴馆》，载《怀集文史资料》，1988年第6辑，第30页。

当今吸取宾兴的有益经验，对于推进教育改革很有意义^①。陈其中《北流宾兴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县群众助学组织》认为，宾兴是科举时代地方官对将应乡试的士子以宾客礼待的一种形式，而宾兴馆则是对士子礼待的地方，北流宾兴馆是全县范围的群众性助学组织^②。黄华强、杨武桓《钦县的宾兴馆》介绍了清代至民国间宾兴馆的建立与演变情况^③。黄小红《高要宾兴馆与宾兴局简史》从历史发展、机构设置、经费来源以及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四个方面介绍了高要县宾兴馆与宾兴局，认为“宾兴馆与宾兴局自创立之后，便为高要县及城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操劳，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促进了本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④。于隆森《原道书院与南乡宾兴》介绍了南乡宾兴的区域、捐助标准、宾兴产业^⑤。陈山《我县曾有三座“宾兴”》分别介绍了清代至民国年间广西陆川县的县城宾兴即六合堂、乌石宾兴和沙坡宾兴的概况，并指出宾兴的资产是“由各姓氏合来的，是用来发展陆川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的，如为了鼓励青年学业上进，给留学生、大学生、高中生以补助”^⑥。总体来说，这些文章多对宾兴的助学性质给予了肯定评价，并认为其对于当代教育公益活动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毛晓阳《清代江西乡绅助考活动研究》是国内外第一篇宾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从江西宾兴基金的发展概况、宾兴基金的种类、宾兴基金的建立、管理与发放三个方面对清代江西各县宾兴的总体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同时以奉新、宁州（今修水）、靖安、泰和为典型个案，分析了宾兴的地域级别问题。该文指出，清代后期江西各县所捐设的助考基金组织以宾兴会最为普遍，因而“将清代江西各县的助考基金统称之为‘宾兴基金’”^⑦。

① 杨海峰：《宾兴：近代本县的“教育基金会”》，载《桂平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第16页。该文后以《宾兴——桂平县近代群众的教育基金组织》为题，发表于《广西教育志》，1990年第2期。

② 陈其中：《北流宾兴馆——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县群众助学组织》，载《北流文史资料》，1989年第5辑，第17页。又见《广西教育志》，1990年第2期。

③ 黄华强，杨武桓：《钦县的宾兴馆》，载《钦州文史资料》，1989年第5辑，第67页。

④ 黄小红：《高要宾兴馆与宾兴局简史》，载《端州文史资料》，1990年第4辑，第93页。

⑤ 于隆森：《原道书院与南乡宾兴》，载《黄岩史志》，1991年第7—8期，第57—58页。

⑥ 陈山：《我县曾有三座“宾兴”》，载《陆川文史资料》，2000年第11辑，第149—150页。

⑦ 毛晓阳：《清代江西乡绅助考活动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2页。

进入21世纪以来,科举宾兴研究逐渐得到重视,单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与硕、博士学位论文陆续问世。

从教育史的角度研究宾兴的单篇论文有:李琳琦《略论徽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对徽商兴办文会、捐输科举资费以及捐建考棚、试院、试馆、会馆等一系列资助地方教育的活动进行了述评。李才栋《古代地方助学助考机构——宾兴会》指出,“科举已废一百年,与其‘配套’的宾兴机制及其余响业已消失五十余载。然而贫寒之士欲顺利通过各级教育机构的选拔或淘汰,进入更高的教育层次,接受更高的教育,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怀”。作者认为,“历史上的宾兴现象仍对我们当今的教育有借鉴意义”^①。

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宾兴的单篇论文有:李世愉《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主要论述了清代财政性宾兴经费的分配情况,对部分官员或民间捐设宾兴的情况仅偶尔涉及。毛晓阳《清代台湾宾兴考述》(《台湾研究》2006年第1期)将宾兴分为国家财政性科举经费与民间捐设科举经费两种类型,首次对清代台湾地区的科举经费问题进行论述。毛晓阳《清代宾兴礼考述》探讨了清代宾兴礼概况及其历史源流,指出“宾兴礼是盛行于清代全国各地的一种科举典礼,主要是指府州县级别的地方官举行宴会送别科举生员”^②。2011年,毛晓阳又在《清史研究》第3期发表《清代宾兴礼补论》一文,进一步对清代宾兴礼的典礼内容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订。周兴涛《论助考之宾兴——以清代四川为例》对清代四川宾兴的助考费用、资金来源、管理作了梳理,认为:“宾兴是科举社会的产物和标志,有助学的成分,更是以助考为主旨;是地方政府的典礼之一,更是一种经济活动;其性质既有官方的,又有民间的,更有官民结合的;其来源可上溯至宋代而非明代。”^③ 杨品优《清代江西宾兴组织探析》认为,“江西的宾兴组织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种基金会或企业组织”、“宾兴组织主要由地

① 李才栋:《古代地方助学助考机构——宾兴会》,载《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35页。

② 毛晓阳:《清代宾兴礼考述》,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45页。

③ 周兴涛:《论助考之宾兴——以清代四川为例》,载《科举学论丛》(第二辑),线装书局,2007年,第32页。

方绅民创设和管理,这表明清中叶以后地方士绅权力和影响的逐步扩大”^①。熊昌锟《清代桂东地区宾兴文化圈述论》提出了“宾兴文化圈”的概念,侧重从宾兴组织者的背景出发,分析了宾兴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了士绅在宾兴文化圈中所起的作用^②。杨品优《清代江西宾兴组织的兴起述论》认为:“士绅控制的科举会社组织于清中期的兴起,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社会经济结构和控制方式出现的某些值得注意之面相。”^③

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宾兴的单篇论文有: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以清末江西清江县宾兴会为个案,分析了官吏、士绅和商人三个实力阶层对地方公共事物的参与及对地方公共权力的分割。作者指出,清江县宾兴会的性质已非最初单纯的助考基金组织,“实际上变成了地方公共事务的关键机构和支柱”^④。徐萍《〈清江县宾兴全集〉与晚清清江地方社会》,对《清江县宾兴全集》一书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与分析,指出“《清江县宾兴全集》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晚清清江县宾兴的产生和随后整个的运作过程以及其中的种种问题,为研究晚清清江的地方教育提供了详尽的资料”^⑤。陈瑞《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对安徽绩溪县的宾兴活动进行了叙述、分析与评论,认为:“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⑥ 衷海燕、唐元平《清代宾兴会功能的演变——以江西吉安府为例》认为,随着时代变迁,宾兴会的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不少宾兴会已

① 杨品优:《清代江西宾兴组织探析》,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13~114页。

② 熊昌锟:《清代桂东地区宾兴文化圈述论》,载《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4期,第55页。

③ 杨品优:《清代江西宾兴组织的兴起述论》,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8页。

④ 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5~82页。

⑤ 徐萍:《〈清江县宾兴全集〉与晚清清江地方社会》,载《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3年第31期,第29页。

⑥ 陈瑞:《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载《安徽史学》,2005年第5期,第88页。

不只是纯粹的教育机构，而逐渐发展成为士绅聚会的场所，并成为社区活动的中心，一些宾兴会甚至开始介入地方公共事务，部分地参与了地方权力的分配^①。杨品优《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认为，江西南康县宾兴会演变的历史表明，“由于对太平军的战争，原为科举会社组织的宾兴会已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士绅大量地参与了原属地方政府的公共福利、社会救济等事务，宾兴会已成为准政府机构。社会权势的转移，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权的逐渐下移，这是咸丰朝以后江西乃至整个中国南方社会的显著特征”^②。作为一种个案研究，文章对南康县宾兴会的评述是准确到位的。杨天保《晚清民国的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讨论了玉林宾兴的地理分布及其兴教历史，以及乡绅、移民与地方官等社会力量在宾兴馆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晚清民国的宾兴馆舍，率以一种民间‘自组织’的近代形态，充当了中国社会转型之际的活跃因子”^③。杨品优《略论明清时期赣东北的科举会社》讨论了江西东北各县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资助士子卷资、旅费的宾兴组织，指出地方士绅在科举会社的设立和管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并认为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方式的某些特点”^④。

另外，毛晓阳《宾兴研究与科举学》从科举学的角度，阐述了宾兴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价值，认为宾兴研究是科举学的新兴研究门类，“宾兴作为古代教育第三部门，为研究者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综合性角度对科举社会进行剖析，提供了极佳的个案”^⑤。杨品优《江西公藏宾兴资料简介》（《兰台世界》2010年第7期）从科举文献学的角度，对江西省内各图书馆、档案馆等收藏的宾兴资料作了介绍，为相关研究者的文献查询工作提供了便利。姚柯楠、刘绍

① 袁海燕，唐元平：《清代宾兴会功能的演变——以江西吉安府为例》，载《教育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30页。

② 杨品优：《科举会社组织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以晚清至民国江西南康宾兴会为例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2页。

③ 杨天保：《晚清民国的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载《广西文史》，2009年第4期，第44页。

④ 杨品优：《略论明清时期赣东北的科举会社》，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2页。

⑤ 毛晓阳：《宾兴研究与科举学》，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80页。